

从民主社会主义论争看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变迁

祁 建 民

Thinking the Change of Social Thought in Moder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rgumentation in Democratic Socialism

Jianmin QI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due to the conditions in China and the “Revolution Export” by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he movement of socialism in China took the path of violent struggle similar to Soviet Russia. However, since the 80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fter the prolonged war-torn era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ese started the process of reconsider violent revolution. In 2007, the argument on Democratic Socialism was on re-evaluation of violent revolution within the realm of Marxism and Socialism. The essence of the argument was: whether Marxism is all about violence, whether socialism must involv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whether class struggl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Exploitation established in the past still exists, and is reconcilable, whether Democratic Socialism belongs to Socialism or Capitalism,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Even though this argument involves different opinions on whether Democratic Socialism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are compatible with each other, it tends to agree with the recognition o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and on the diversity of socialism.

Key words: Democratic Socialism, violent revolution,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经历过长期战乱和“文革”式血腥斗争之后, 中国人开始了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反思, 虽然人道主义争论被禁止,¹ 但是 21 世纪初又出现了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² 自中共建党以来就被奉为圭臬的阶级斗争理论受到质疑。2007 年, 关于“换旗”问题, 即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范围之内对暴力革命进行重新思考。这场争论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完全主张暴力? 社会主义是否必须要有民主宪政? 以往建立在剩余价值剥削理论上的那种阶级对立是否存在和能否融合?

1 参见王若水:《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年)。

2 参见 JIANMIN QI (祁建民):「The Debate over ‘Universal Values’ in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20 NUMBER 72 NOVEMBER 2011.

其实，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主张在历史上也有变化。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共产党，1848年革命则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始。1864年国际工人联合会（史称“第一国际”）成立，但是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遭到失败，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虽然1889年社会主义国际（即“第二国际”）建立，但是面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连续失败和低潮，恩格斯晚年提出随着资本主义议会民主的发展，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议会民主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恩格斯去世后，围绕革命是否要走议会道路、改良路线等发生分歧，第二国际由此分裂和解体。其实，在欧洲发达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及其运动并未因此而停止，其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冲击在促使资本主义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西方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一些国家通过选举实现了民主社会党执政，其民主、人权和社会福利政策得以真正实行。

在20世纪初，由于中共的建立深受苏俄“革命输出”的影响，中共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第二国际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在中国没有得到传播。只是在1920年代出现过像江亢虎那样的社会民主主义，但影响不大。不过，100年之后，到了21世纪初期经过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反复波折之后，中国人又开始关注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2007年爆发了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换旗”之争，标志着中国人重新审视恩格斯去世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历史，重新评价过去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对于非暴力革命、私有制和人道主义以及民主宪政等开始重新认识。

一、“换旗”争论的出现

2007年，在中国出现了“换旗”之争。有人公开主张中国也要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彻底放弃从建党以来就一直坚持的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因而这就成为一场非同小可的论争。这时出现这种观点是与邓小平所提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突破了一些科学社会主义传统观念和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并进一步要求大胆创新的结果。由于民主社会主义主张马克思主义多元化，不拘泥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这就使得对社会主义有了更广阔的解释空间，也就便于人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更加自由地探索。

挑起这次论争的首先是号称中共第二党校的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谢韬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上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谢文首先对现代世界上的各种社会制度进行比较，他说到：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灭亡了，帝国主义衰落了，只剩下3种社会制度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和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而“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就是说民主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了世界的主流。

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作用，他归纳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还说，现在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而“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

谢韬断定中共的改革开放走的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他说：“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等同志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1978年公有制比重占99.1%），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他认为：“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是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又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2002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说三代领导人都是在搞民主社会主义。

在中共官方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民主社会主义是被一贯指责为“修正主义”的。谢韬主张中共目前的改革路线就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那就必须要为“修正主义”翻案。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在这里，他极力推出辛子陵的研究成果，他说：“作者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创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为此，谢韬要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二国际”的著名“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翻案，同时批判了列宁以来的第三国际。他说：“不是伯恩斯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斯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因为“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能力的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这样，谢韬就彻底推翻了以往的官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把过去被批判的修正主义完全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列宁才是离经叛道。他说“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1848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由此他大胆放话说：“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谢韬最后提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两个特征，这就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上的民主宪政。他强调了私有制和贫富差别存在的合理性，赞扬了民主社会主义允许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主张实行混合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政策。谢韬为了说明要有资本主义经济、私有制和贫富差别存在的理由，强调了“生产力论”的观点。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为了发展生产力就要允许社会差别存在，没有差别就没有进步。他认为：“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说来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这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不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是前者，这是唯物主义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他进一步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操作这个杠杆，有一个合理的‘度’（现代经济学称之为‘基尼系数’），超过了这个‘度’，社会就要爆炸；消灭了这个‘度’，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前进的动力。”而在苏联、东欧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理想社会奋斗几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误导就是企图消灭这个‘度’，用‘大锅饭’的办法‘均贫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贫’而自豪，造成几十年来生产的停滞和衰退，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老也发挥不出来，砸了‘社会主义’的牌子。”

按照这种逻辑，“共产主义社会”就成为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谢韬根据辛子陵的研究说：“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据说：“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他认为“共产主义”理想是受到基督教文化和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演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同时，“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永无止境，而是要达成一个终极目标，完成一个社会形态。”所以，“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恩

格斯而言，则是共产主义社会。”但是，设定出“共产主义”理想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是有害的。谢韬说：“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

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宪政”，谢韬把它作为这个社会的核心。他说：“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他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在说明了中共的经济改革是走上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之后，谢韬还希望在政治上中共也要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宪政，这就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谢韬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我党我国如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而不使政治体制改革紧紧跟上去，说重点的话，我们真可能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³

谢韬的文章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重新解释的角度，鼓励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在经济上要搞私有化，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宪政，可谓十分大胆，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激进改革主张可以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较之“六四”之前的“自由化”言论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他是从民主社会主义的角度阐发，依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号称是要回归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初衷，并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这可以说是“六四”之后，搞“自由化”的新的表达方式。

其后，中共党内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何方在其《自述》中也对民主社会主义提出赞赏。他认为，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真正做到了经济繁荣、政治民主、自由充分、福利完备、社会稳定、道德良好（清廉居世界头几名，贪污腐败和犯罪率最低）、人人平等（除政治上以外收入差距也最低）。消灭了等级制和特权，总理、部长在工作时间配用专车的不到五人，首相或总理的家庭也不配备服务人员。更没有工资的‘含金量’差别极大和什么正部长级的副部长、以及医疗、住房、用车等分类的‘正部级待遇’、‘副部级待遇’这些怪名堂。基本上消灭了三大差别，做到了普遍富裕等等。以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为标准，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的道路是基本正确的，而且成绩不小。”⁴在他看来，这才是真正的理想的社会主义。

解放军国防大学研究员辛子陵也发表文章说，1970年代，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访问英国，对于英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之高感受很大。对于当时英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从带有成见的怀疑、蔑视到惊讶、赞叹、向往。”他说，王是中共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回国后坚定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是把西欧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参照物制定改革开放政策的。”邓小平之后的“三个代表”理论的本意是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包容、保护和重新定位。而科学发展观是超越了姓社姓资的狭隘眼界。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理论和政策都是借鉴民主社会主义的。⁵

另外，阎长贵撰文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确实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⁶冒天启认为：恩格斯“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反思过去曾经提出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旧社会和平长入新社会的思想，普选制是一种全新的武器。但这个思想，长期被我国思想界所封杀。”⁶关山根据自己对于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考察，提出三点启迪，即社会主义模式是多元的，中国必须走循序渐进的改革改良的道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学习民主社会主义好的东西。⁸

3 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4 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下，（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页761—762。

5 辛子陵：《对资产阶级认识的历史变迁》，《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

6 阎长贵：《马克思恩格斯确实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黄达编：《大论战 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出路》（香港：天地图书，2007年）。

7 冒天启：《对恩格斯晚年社会发展思想的再思考》，黄达编：《大论战 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出路》。

8 关山：《北欧四国社会模式的见闻与思考》，《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黄达编：《大论战 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出路》。

谢韬等的文章一经发表，马上引起广泛的反响和争论，当然批判的火力会很猛。2007年3月，在杭州由浙江省委党校等单位召开会议，对于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大加批判。上海也召开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问题座谈会”声讨“民主社会主义”。4月，由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毛泽东的人民历史观课题组”和“毛泽东旗帜”网站共同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批驳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研讨会”。会议上有人说：谢韬“蓄意抛出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纲领，其目的是进行所谓‘政治改革’，颠覆党的领导、颠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是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对他的恶劣影响决不能低估。”⁹张飞岸在文章中还分析了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出现的背景，他认为，苏东剧变，“在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被宣判死刑之后，改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成了社会主义者的唯一选择。作为对自己多年来信奉的理想的慰藉，中国许多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人，开始极力推崇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影响逐渐扩大。”但是，他认为这种趋向关系到了中国的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因为，“当民主社会主义在新自由主义的进攻下宣布它承认资本主义的永恒逻辑时，对于它的态度已经成为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而关于中国未来是选择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特色社会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也就是关于中国未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¹⁰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张全景在《求是》发表文章，全面坚持第三国际以来的论点，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主张中共与民主社会主义根本不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修正主义，是根本错误的。”¹¹王东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也不是社会主义主流，而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一个支流，主要发生在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其本质特征是社会改良主义，只讲渐进改良，不讲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变革。”而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¹²

其后，中国社科院网站上发表了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和杨承训的对话，刘国光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思潮是一脉相承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他说：“在挑起‘社会主义模式’混战前，那赤裸裸不讲社会主义只要‘市场化改革’的思潮，不需要多少学问就可以嗅出它的‘新自由主义’的味道。‘新自由主义’成为过街老鼠以后，某些人一窝蜂地投向‘社会主义’，讨论起‘社会主义模式’来，明白人就嗅出其‘民主社会主义’的味道。”刘说：“他（指谢韬一笔者）从国外端来的一套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东西，除了‘福利保障制度’这一点，“其余‘民主宪政’、‘混合所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他国内同行推出的先行模式大体一样，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只是在“论证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正宗’上面，与他国内先行同行相比，有独到之处。”“但是这些‘论据’，最近已被马克思主义专家们的一系列考证所击碎”。刘还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进行了说明：“他把‘民主’二字放在‘社会主义’的前面，作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向我们党推荐的时候，难道不知道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反复把他们自己思想体系的名称，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改来改去？苏东剧变以后，又把1950年代改称的‘民主社会主义’颠倒过来，改成‘社会民主主义’，以回避在苏东剧变中已被资产阶级妖魔化了的‘社会主义’对自己的牵连。他们不再把‘社会主义’视为奋斗追求的目标制度，放弃要求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满足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点滴改良。”¹³

9 引自金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打退极左们的猖狂进攻》，曹天子编：《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中国改革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

10 张飞岸：《空想的民主社会主义——对于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改良派的回应》，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网，2009年3月9日。

11 张全景：《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吗？》，《求是》2007年第11期。黄达公编：《大论战——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出路》。

12 王东：《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正统吗？》，《中国教育报》2007年6月12日。黄达公编：《大论战——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出路》。

13 《坚持基本路线必须澄清错误思潮——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于杨承训的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网站（<http://www.cass.net.cn>），《专题集锦》，《刘国光近期重要文章》，2009年7月6日。

张飞岸从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同的角度，提出在中国没有条件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他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得到有效实施并取得显著效果的资本主义改良运动，越出了发达国家界线，民主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试图在落后国家建立好的资本主义的空想。民主社会主义由于是企图在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进行有利于劳工利益的改良，所以它的实施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资产阶级能够在维护劳工利益的前提下继续资本的积累，能够把资本积累造成的社会分化矛盾向国外转移；二是劳工要有自己强大的组织，要能对资方构成强大的压力，迫使其不得不接受有利于劳工的改良方案。但是，现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具备与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在国际上争夺资本积累空间的能力。由于我国民族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因而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遵循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既定方针下，我国主流经济学家又强调要发挥中国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依附于外资的、低附加值的产品加工业。缺乏国际竞争力的资本、廉价弱势的劳工，这两项极具中国特色的生产运作条件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展前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资本和强大的劳工力量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可以预言在中国发展民主社会主义，首先不是遇到来自劳工而是遇到来自资本的反抗，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会允许中国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因为劳工对抗力的加强和福利的增长正是以其利润的削减为条件的。由于中国不具备发展民主社会主义的条件，因而在中国倡导民主社会主义的实际结果，只能是遏制劳工力量的野蛮资本主义。山西的黑砖窑，广东的血汗工厂已经为我们初步展现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张断定：民主社会主义不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是改良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倒退，是一种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倒退。¹⁴

张树华则从苏联解体的教训论述了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他提到，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苏共领导尤其对瑞典的“福利社会模式”大为推崇。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高层干部纷纷前去访问、取经。苏共宣布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由此“思想开始迷乱，组织上自掘坟墓。”他的结论是：“苏联东欧的变化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¹⁵以苏联崩溃为例说明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走，对于中共许多人确实是有震撼力的。杜建国则通过回顾欧洲主要国家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说明他们是一个自我毁灭的过程，因为到1940年，除英国和瑞士、瑞典等国以外，欧洲社会民主党已经全军覆灭了。他质问到：“（斯大林的一笔者）官僚统治破产了就能证明社会民主党更加光彩吗？”¹⁶

面对民主社会主义受到如此的批判，积极主张民主化的中共宣传工作老干部胡绩伟认为可以用“新民主主义社会”来代替民主社会主义的提法，他说：“我考虑过民主社会主义的提法，为什么他们不赞同？恐怕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搞和平斗争，不搞武装斗争，军队为国家所有，政党不能拥有军队；第二，搞多党制和议会斗争，就不能搞一党专政；第三，搞混合经济；第四，不搞思想垄断。民主社会主义这些东西，共产党都接受不了。所以，我考虑提新民主主义比较容易被接受，第一，要在党的领导下；第二，军队不变；第三，经济上维持公有制为主；第四，在共产党领导下，逐步地发展思想言论自由。”他还说：“现在重提重建新民主主义，也不能照搬延安时期、建国时期和胡赵时期，也要按新的历史条件。有一条应该肯定，应该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应是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反帝的任务现在没了，但反霸权主义、反恐怖的任务还有；以前反官

14 张飞岸：《空想的民主社会主义——对于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改良派的回应》，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网（<http://myy.cass.cn>），2009年3月9日。

15 张树华：《苏联解体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原载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报》2007年4月19日），曹天子编：《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中国改革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16 杜建国：《唯议会主义的悖论—社会民主党的自我毁灭》，曹天子编：《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中国改革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僚资本主义，现在应该反权贵资本。中国长期处在新式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¹⁷胡的主张要比谢韬的观点折中一些，并且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作为理论来源，但是其在要搞资本主义这一点上是明确的，因而在实质上与谢韬的观点是相近的，他就说：“我左右寻思，感觉用‘新民主主义’一词更为合适，虽然多少有些万不得已。”中共农村改革的元老杜润生认为韬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这个提法，口气硬了，不一定妥当。”“但是我很赞成独立思考。”他说，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好的方面要吸收。总之，只要人民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¹⁹

二、这场争论的主要焦点

（一）“民主社会主义”姓“社”还是姓“资”

这场争论的中心就是围绕“民主社会主义”是否是属于“社会主义”而展开的。杨启先在其《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就认为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两者的‘老祖宗’都同出一家，承认民主社会主义是属于马克思社会主义的。谢韬则更明确地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仍然属于“社会主义”，并且与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相通。所以他主张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并不是离经叛道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金焯支持谢韬的观点，也主张“民主社会主义”是属于“社会主义”方面的。他说：“民主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层为主体的争取民主平等的政治运动，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就是不断反对资本家阶层，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不人道和罪恶剥削的历史，主张通过建立符合人性和理性的社会共同体的合作经济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用民主法制的方法维护工人阶层的利益，”他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当初是社会主义的两大分支之一，由于苏式社会主义封建专制化，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才成了世界上唯一的公认有影响的社会主义。”与谢韬一样，金焯在文章中也阐述了“民主社会主义”中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金焯对现代资本家阶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劳资合作，相互包容是可以实现的。他说：“资本家阶层事实上依然是心胸开阔通情达理的革命和先进的阶层，并不像极左派描述的那样阻碍社会和生产进步，对社会和工人冷酷无情，为保持高利益率而拒绝工人的合理要求甚至于对抗镇压工人。”他还说：“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家与工人和谐相处，自愿地和平地用自己的私有财产，救济贫困阶层的人士，无偿地捐赠给全社会已是屡见不鲜了，只有极左派才视而不见或极力诋毁。”也就是说在民主社会主义中劳资双方是互助协调的，可以共存，并不是必然对立的。²⁰

周新城则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属于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改良的资本主义，他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尽管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它反对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主张实行听任资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多党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赞成以议会民主、三权分立为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反对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要求实行私有化；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它否定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共性，不赞成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怎么还会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呢？”他还说：“西欧有的国家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执政几年、几十年以后，自己也承认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而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当政的短短几年时间里，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很快就从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这一事实说明，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

17 胡绩伟：《要自由民主？还是专制垄断？——纪念胡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李锐等：《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 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页45—47。

18 同上。

19 杜润生：《理论思维活跃是民族振兴的喜庆气象》，《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黄达公编：《大论战——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出路》。

20 白金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打退极左们的猖狂进攻》，曹天予编：《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中国改革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式，它是资本主义，只不过主张对资本主义作若干改良而已；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民主社会主义则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桥梁。”²¹ 他强调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同，依然坚持列宁以来的社会主义模式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并且提出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就是由于搞民主社会主义的恶果。

人民大学教授高放从社会资本的占有关系说明了民主社会党执政的国家依然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他说：“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执政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但是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模式在西方没有完全实现，还在探索当中。比如，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时间最长，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这就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瑞典国家94%的生产资料还集中在一百家大资本家手中，17个大财团还支配着瑞典国家的经济命脉，国家股票的三分之二由占瑞典人口2%的富豪控制，而98%的平民百姓则只占有股票的三分之一，可见瑞典还是私人资本占统治地位，因此很难说瑞典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实还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²² 他认为财产占有的不平均就是资本主义。

（二）要不要实行“民主宪政”

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另一个特征即民主宪政问题则是更加敏感的问题，这涉及到对于列宁、斯大林以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根本评价问题。谢韬主张：“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支持谢韬的观点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所主张的人民民主执政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意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金焯就说：“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有关文章得知，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劳动人民执政的民主共和制。民主就是民治，由所有的公民来自己治理国家，而不是由官僚特权阶级和特定的特权材料铸造的精英或世袭的龙种们来治理国家。民主是所有公民的民主，而不是一部分人的民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他还提出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中为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巴黎公社实行了普选和公务员低薪制。而在后来，“民主社会主义实行的正是无产阶级专政——应修正为马克思原意的人民民主执政，而苏式社会主义恰恰在这一基本原则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一个没有内容的文字空壳和吓唬人的镇压机器的大旗，拒绝马克思设计的普选制和人民监督罢免干部的权利，拒绝公务员低薪制，把国家机器重新变成了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旧机器”。金甚至借网友的话说：“‘中特’与‘民社’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主张‘保姆当家’还是主张‘主人当家’，就在于是否承认‘主人有权炒保姆’。”²³ 吴敏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不是民主思想、民主运动和民主组织原则的发展，世界上就不会诞生共产党。“民主、自由决定着共产党的存在价值和前途命运。”但是由于苏共和斯大林模式以及中国封建专制历史的影响，中国非民主的东西很多，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²⁴ 据谢韬说，他的文章发表后，许多老朋友给他打电话强调了两点，“第一点，我们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历史教训不再搞暴力、不再搞阶级斗争，必须要搞和平演变，和平共处，这些对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一个是从党的历史来看不搞民主是不行了，专制的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要民主的社会主义才行。”²⁵

反对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则认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出现，必须

21 周新城：《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曹天予编：《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中国改革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22 高放：《百年来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关系的演变—兼谈“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中国”》，曹天予编：《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中国改革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23 金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打退极左们的猖狂进攻》，曹天予编：《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中国改革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24 吴敏：《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炎黄春秋》2007年第3期。黄达公编：《大论战 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出路》。

25 《“民主与社会主义”专题研讨会发言纪要》（之一），黄达公编：《大论战 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出路》。

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后，才能建立。他们认为：“这里，任何‘民主、自由、公正、团结’的说教都是无济于事的。社会党曾经在欧洲几个国家里执政几年、几十年，宣称实施了这些原则，但丝毫没有改变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这是由于“在阶级社会里，并不存在抽象的、全人类共同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他批判社会民主党说：“他们所说的‘全人类共同的价值’，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²⁶ 高放则从政治安定的角度认为，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是不能完全照搬民主社会主义，否则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难题：如果在我国实行西方那种多党平等竞争的民主，中国的政局就会大乱，改革成果就会丧失。”²⁷ 民主、自由只是抽象的说教，在中国一搞民主就会天下大乱，这是1980年代以来保守派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一贯论点。萧枫虽然批评了谢韬对于恩格斯晚年思想的解释有误，但是他也认为谢韬提出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观点“这是正确的”，希望加快政治改革解决严重腐败问题，是“反映民意的。”²⁸ 可见，在民主宪政问题上，双方差距并不大。

（三）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

这次争论也涉及到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谢韬等主张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中国也要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如王家典所说：“恩格斯晚年开拓的民主社会主义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自我修正、成熟发展阶段的产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直接继承了他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继续领导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就是他们最杰出的思想家代表。”²⁹ 这是对以往官方“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重大颠覆。而批判的一方虽然否定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认为其主张和政策依然属于资本主义的范围，不过，即使是否定民主社会主义的人也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并要处理好与欧洲社会党之间的关系，没有坚持过去的全面否定民主社会主义，把伯恩斯坦等指责为是马克思主义叛徒、是搞“修正主义”的说法。这表明过去那种完全肯定暴力革命是唯一道路的观点已经被绝大多数人所放弃。

徐友渔则更加彻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套都不行。他说谢韬的文章依然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是一个绝对真理，“他想证明的是‘你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对马克思主义丝毫没有批判性思考。“其实马克思主义是会导致暴力革命这一套东西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搞‘托古改制’这一套，一定要说现在追求自由、民主、现代化是符合我们老祖宗的教条？”³⁰ 他主张中国未来的发展不应该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范围之内。

高放虽然不赞成谢韬的观点，但他还是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不能完全否定，应该加以借鉴。他说，恩格斯晚年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提出一个新观点，即随着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发展，将来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国家可以利用议会民主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这个新观点并没有否定暴力革命。这种设想是晚年恩格斯提出的“一个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灵活策略”。恩格斯去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伯恩斯坦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路线和卢森堡主张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路线。所以，共产党与民社党、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本来是同宗、同根、同义、同党。”高放还引用了胡乔木的这样的话：“共产国际（指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笔者）犯了两方面的错

26 周新城：《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曹天予编：《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中国改革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27 高放：《百年来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关系的演变—兼谈“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中国”》，曹天予编：《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中国改革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28 萧枫：《谢韬先生〈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之我见》，《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2期。黄达公编：《大论战—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出路》。

29 李锐等：《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页240。

30 《“民主与社会主义”专题研讨会发言纪要》（之二），黄达公编：《大论战—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出路》。

误：一是对第二国际没有留一点余地，把它说成是反革命，是社会帝国主义，列宁这个判断也是不正确的，把社会民主党完全等同于帝国主义，结果弄到现在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很难合作。这么大的问题这么简单地处理，留下后遗症是不小的。二是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可以说是列宁关于共产党建党思想的扩大。”高放提出：“我们今天要借鉴民主社会主义，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不能改变。”³¹

即使是对谢韬文章完全持批评意见的周新城也说：“社会党终究是资本主义范围内的左翼，在不触动雇佣劳动制度这一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这是它们与保守党等资产阶级右翼不同的地方。”其某些具体做法值得借鉴，在党际关系上也应开展交流。³²

但是，张飞岸却认为，19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主社会主义有本质的不同，现代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已经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因而对于国际共运是消极的。他说到，19世纪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从殖民地获得大量利润，资本家可以拿出一部分利润与工人分享，当然这是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实现的。民主党由此调整斗争策略，宣布要通过改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但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民主社会主义宣布放弃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所以两者有本质的不同。现在，社会民主党为自身既得利益所束缚逐渐与资产阶级社会融为一体，完成了从改良到改良主义的蜕变，后来在新自由主义的反攻下出现危机。所以，“民主社会主义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它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极影响是致命的。因为它消磨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抹去了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价值，掩盖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锋芒，把工人运动的方向从替代资本主义转向争取自身的经济利益，这些都使无产阶级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面对资产阶级的反攻，长期处于一种没有战斗力的集体无意识状态。”³³对于现代民主社会主义完全持否定态度。

（四）“劳动产权”与“公民权利”

丁宁宁在对近年兴起的劳动产权理论进行批判的同时，对现代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一样，不可避免会出现劳资之间的矛盾，而“要在资本与劳动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只能从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入手。”他说：“西方国家百年以来的社会进步是从哪里来的？修正主义政党和‘灰色’工会争取工人民主权利和改善工人经济状况的斗争，难道就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了吗？敢于夺取政权的无产者可以批评他们的软弱，但没有权利责备他们维护工人权益的努力。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修正主义和‘灰色’工会的不懈努力，西方国家才废除了公民身份的财产资格限制，实行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所以，“社会民主党和费边社的实践告诉我们，避免阶级冲突的正确途径，在不断壮大的资本面前坚决捍卫公民的权利”。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和费边社并没有向资本权益提出正面挑战，但他们捍卫劳动者（公民）权利的努力却获得了很大成功。”他还提示，在中国市场经济下，资本与劳动的对立重新出现，这不是劳动（力）产权理论可以解决的，而应该借鉴社会民主党的做法，从捍卫劳动者的公民权利入手。要在保护资本利益的同时，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³⁴既要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又要维护工人利益。

31 高放：《百年来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关系的演变——兼谈“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中国”》，曹天子编《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中国改革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32 周新城：《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曹天子编：《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中国改革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33 张飞岸：《空想的民主社会主义——对于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改良派的回应》，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网（<http://myy.cass.cn>），2009年3月9日。

34 丁宁宁：《“劳动（力）产权”难以作为理论创新的出发点》，曹天子编：《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中国改革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这同民主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对于丁宁宁所提倡的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海外思想家曹天予认为：“这一思潮，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同时又力图找到可行的办法来消除现行改革所带来的实际恶果，并进而把这些办法定义为现实的、可行的社会主义，（以此与传统的、失败了的社会相对照），从而力图为，并似乎已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困境提供一条出路。可是，从丁文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作为社会民主主义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仍然是保护资本剥削劳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民主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想通过保护人权民权、实行调节性的二次分配、建设福利国家来缓和雇佣剥削必然带来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从而避免激烈的社会动荡。”但是，曹指出，这样的转换涉及到中共意识形态的核心即放弃对于社会主义的承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把中共的基本意识形态改为保护雇佣剥削，这就关系到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和其内部的凝聚力。³⁵因而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十分重大。同时，曹也指出，如果在那样的福利国家中，劳动者要在二次分配中得到一些补偿，“那得一看资本家的好意，二看自己的斗争能力了。”³⁶笔者以为，在中国这样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盛行和缺乏社会组织性的社会中，要实现这种结果的确也是很难的。

三、中共官方的态度

中共高层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依然采取“不批判”、“不炒作”的办法。但是也故意低调进行回应。《人民日报》编辑部曾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发表文章，该文在叙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之后，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进行了如下区别：（1）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上，科学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民主社会主义则由最初信奉马克思主义，逐步变为把指导思想多元化奉为自己的思想纲领。（2）在对待社会主义上，科学社会主义强调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最终实现人民的幸福、解放、民主和自由。同时，也强调社会主义要吸收借鉴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而民主社会主义从最初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目标，逐步变为仅仅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否认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3）在对待资本主义上，科学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依据，但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固有矛盾，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用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取代消灭私有制，用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来缓和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文章还提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不同，强调在中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决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坚持中共的领导，决不搞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等。³⁷实际上是否定了谢韬等要搞民主社会主义的说法，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明确区别开来。《光明日报》也发表了徐理的文章，该文的内容与《人民日报》的答读者问基本一致，文章最后提到：“民主社会主义在某些方面如在提倡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这决不是说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社会民主主义道路。”该文基本上是否定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对于民主社会主义也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批判，反而提出可以借鉴，表明中共高层也在一定程度改变了第三国际以来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严厉批判态度。

35 曹天予：《劳动产权与改革的目标模式：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一评李惠斌博士的新作兼与丁宁宁博士商榷》（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二期），曹天予编：《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中国改革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36 曹天予：《也谈模式和前途—读谢老近作有感》，曹天予编：《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中国改革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37 《人民日报》编辑部：《如何看民主社会主义》，《人民日报》，2007年5月10日。

38 徐理：《正确认识民主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光明日报》，2007年4月24日。

结 论

民主社会主义争论实质上依然反映了对于今后中国改革方向的探讨，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必然要涉及到所有制问题，而经济改革的发展必然要求政治体制的相应变动，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会带来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以往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仅仅限于是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样式继续深化改革？还是否定改革路线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这种左右对立的观点上。而提倡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则为中国的改革提出了一个新的参照物，并且这个参照物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历史渊源关系，民主社会主义可以为中国的改革提出更加有力的正当性依据，即这不是搞资本主义而是要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因而可能减少一些围绕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主张“换旗”的观点要否定的只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模式，从根本上要回归第二国际以来的民主社会主义，这就为中国的改革提出了一个新的坐标。

从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争论，我们也可以看到产生于西方的政治思想要在中国得到传播，必须要有中国社会的需要。1920年代，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未能传播是由于当时中国剧烈的民族和阶级矛盾对立所致，21世纪初头，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再度传入，与目前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相关。当然，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政治思想的接受也进行了选择和再创造。